

因为这些问题，这些地方的数字红利大打折扣

新华社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部分城市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获得显著提升同时，有地方也遭遇“数字堵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相关软件开发运营效能不够、市民对数字化服务认可度不高等问题亟待解决。

部分地方数字化治理能力有所提高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地方数字化治理能力有所提高。

终端效能有所提升。“北市场水果一条街，人行道隔离带被周边商铺私自拆除，望有关部门给予重视。”这一被即时反映到龙岩政务服务平台“e龙岩”的问题，很快由龙岩市城管局依法进行了处理。

“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能更有效地调动市民参与社会治理。”龙岩市大数据局副局长张发盛说。

创新因素得到加强。今年战“疫”期间，安徽实现“安康码”与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和医保电子凭证的“三卡融合”，去医院看病问诊只需“一个码”，就能实现建卡、挂号、取号、预约、充值、查询的全流程贯通。滁州市相关平台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入库速度同比提升10倍以上。陕西铜川则与科大讯飞合作，以“城市超脑”为基础，推动当地智慧政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领域服务能力提升。

法治依据持续健全。《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已于12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政府数据开放边界，将政府数据划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放和不予开放三类。对于无条件开放类的政府数据，应当以可以机器读取的格式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发布，以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利用。

据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主任卢向东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比例达到82%，全国一半以上行政许可事项平均承诺时限压缩超过40%，有力推动了“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等数字治理措施向纵深发展。

数字基础薄弱地区的困境不只是“缺钱少人”

记者调查发现，仍有部分“堵点”阻滞中西部城市数字治理能力提升。

——部分官方网站效能差，服务群众诉求能力较弱。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第三季度全省政府网站检查情况，今年6月至8月，张掖市、武威市、省教育厅对网民留言的办理拖延时间较长，办结率和按期办结率较低；“甘肃消防网”“酒泉市自然资源局”等3家网站办事服务栏目无法打开；另一些地方政府相关网站未提供办事服务或办事指南要素缺失；“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信息网”等8家网站还存在多个空白栏目。

——移动端小程序、App“多而杂”，部分功能却形同虚设。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贵州积极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向移动端延伸，除省市县各级有不同政务服务应用外，还有公安、交通、人社等部门的多类业务平台，而且由不同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在微信上打开某个小程序，在“亮点专区”选择公积金查询板块，按提示实名认证后，点进各市州查询，界面却没有任何响应。

——市民认可度低，“零跑腿”难实现，服务细节存问题。不久前，记者来到贵阳市人民政府政务大厅，一方面在服务大厅内，大量前来办事的群众挤在窗口前等待，其中办医保、交管业务等多个窗口取号等待人数均在20人以上。另一方面，在入口处贴着一张“全省通办 一次办成”的“贵人服务”小程序海报，当时记者扫描二维码进入后发现内容是一片空白。

记者在贵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看到，依申请开放栏的列表已经有一年多未更新。距今最近的去年的一条申请，有关部门也是在数月后才回复。

——电子证照“不通用”，信息跨省互认难。江西省政务服务管理指导处处长邵高介绍，《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明确，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部分场景中，电子证照仅能用来预审，办事人仍须持原件到现场最终办理。记者在江西采访发现，由于数据跨省共享仍未实现，“婚育户一链办”等政务服务目前仅限于夫妻双方均为本省户籍的才能办理。如果父



母有一方是外省户籍，当事人仍需“跑腿”提供纸质户口本。

另外，记者在走访贵州、福建等地部分银行、通信运营商时发现，工作人员对按规定本应与实体证件效力相同的电子证件效力并不认可，仍要求办事人提供实体证件。

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政公用行业专家委员会专家王毅还指出，当前不少地方对城市治理平台建设持续投入能力仍不足，信息上下通畅难以实现；还有地方，数字平台上的治理制度机制体制或尚未建立或无法运行。另外，治理所涉数据信息的安全保障体系仍较脆弱。

专家：打通数字堵点需大处着眼、细处着手

明确数据资源协调管理部门，完善

跨部门数据资源协调机制。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电子政务处主任科员李方东告诉记者，目前国家部委层面涉及政务数据归集与应用的部门数量较多、架构复杂，地方政府在协调部委垂管单位的数据时困难较大。他和多地相关工作负责人均建议，应明确专门机构统筹管理数据资源，完善横向纵向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实现数据供给有效对接，进一步扫除“数据壁垒”。

加强数字治理应用终端运营效能，提升数字治理服务质量。贵州省铜仁市市长陈少荣认为，数字治理应用终端不能是“交钥匙工程”，必须持续高效运维。他建议统筹数字治理平台建设 with 运营，避免重复浪费。建立城市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等数据开放、共享、融通。统筹体系规范，在技术、标准、管理、应用上对数据进

行统一规范，通过顶层设计，防止各行业领域之间、各行业领域内部形成新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

对于数字治理能力建设过程中的信息安全难题，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要加紧推动数字治理能力透明化、规范化、标准化，通过政府管理、群众法律意识的树立以及核心技术的助推，让数字治理能力服务于个人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

邵高建议加快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确保电子证照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推进电子证照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互认，落实制度便民初衷。

王毅还提醒，各地提升数字治理水平，一方面应加大对市民数字生活能力的培训和帮助，增强市民信任度、获得感；另一方面要警惕对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可能造成的“数字鸿沟”。

(据新华网)

很多农民糊里糊涂背上二三十万元债务

“帮缴公积金”“办贷款不用还”……在这些诱人的话术之下，很多农民稀里糊涂背上二三十万元债务。

最近，四川眉山市警方破获“垫缴公积金”新型金融犯罪案件。据警方最新掌握的情况，此案诈骗银行贷款超过12亿元，涉及全国多家银行和6000多个农民。

据了解，犯罪团伙通过“垫缴公积金”这一方式，把四川、广东、湖南、天津、山东、重庆等多地农民“包装”成为公司职员，再利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向银行骗取信用贷款。



“帮缴”公积金，农民背上巨债

不久前，重庆籍50岁农民陈小菊来到眉山市公积金中心，要求提取公积金。然而离奇的是，她无法提供必要手续，对自己的公积金账号、单位名称，也是一问三不知。

工作人员还发现，这段时间，有许多外地人前来提取公积金，他们都是不久前集中补缴的，然后又集中提现。公积金中心报警后，眉山警方迅速介入，四川省公安厅挂牌督办。

据调查，陈小菊在外务工时，一名不认识的男子鼓吹可以“帮她缴纳公积金”，还可以帮她办贷款“不用还”。之后，该男子操作一公司账号为她缴纳公积金，并在手机上以她的身份信息向银行申请信用贷款20多万元。但陈小菊只拿到2万多元，其余被男子转走。

“白捡”2万多元，陈小菊很高兴，即使贷款逾期，她也无动于衷。直到后来，她想起自己还有公积金，缴纳地点在眉山，前来取现时，才东窗事发。

同样背上巨债的还有四川省青神县白果乡渡渡社区农民陈奎林。去年10月，附近村民告诉陈奎林“有老板可以帮忙办贷款”，并且“贷款不用还，想拿来干啥都可以”。于是他提供身份证、办理银行卡、人脸识别一照做。犯罪团伙为陈奎林垫缴公积金后，向银行成功申请信用贷款18万元，他本人拿到1.3万元。直到民警找上门来调查，他还心存幻想地说：“不是说了不用还的吗？”

“在这一新型金融诈骗案件中，涉及最多的是来自偏远地区、没有偿还能力的农

民，其中不乏残疾人、贫困户。”眉山市公安局高新区（甘眉园区）分局案件主办侦查员周峰说，这些农民被犯罪团伙利用，在银行欠下二三十万元，自己只拿到一个零头，有的人甚至一分钱没拿到，稀里糊涂背上巨债。

控制130余家公司账号补缴公积金，伪造银行“优质客户”

住房公积金是在职工的长期住房储蓄，这些犯罪团伙是怎样将农民“包装”成公司职员，为其缴纳公积金的呢？

警方已基本查明，2019年5月以来，以向某、周某某、黄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找来农民这种“纯白户”——征信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客户，为其垫缴公积金，以公积金作为银行进行信用评定的参考物，申请信用贷款。

据悉，这些犯罪团伙非法侵入多地公积金系统，盗取了数十家公司账号，更改就职员工信息，为农民垫缴公积金。而后，犯罪团伙又操控农民身份信息，向银行申请线上贷款。这就使一些原本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农民，成了银行眼中有工作单位、有稳定收入的优质客户。

眉山警方顺藤摸瓜，又在全国查处了多个犯罪团伙。在天津、山东、重庆、湖南等地，一犯罪团伙通过购买手段，获取了多个地方的公积金补缴渠道，诈骗了多家银行贷款。广东一犯罪团伙通过收购“僵尸企业”“空壳公司”，获得了广州、深圳等地公积金缴存渠道，以此诈骗银行贷款。

据专案组初步统计，这些团伙分别控制了上述省市130余家公司账号，找来全国各

地6000多个农民，为其补缴公积金1.2亿元，诈骗银行贷款超过12亿元。

“虽说犯罪团伙花了些钱，为农民垫缴公积金，但是贷出来的钱更多，获利10倍以上。”一名办案民警说。

截至目前，专案组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19人。肖某是其中一名嫌疑人，据他交代：“我们这种犯罪手法，大概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兴起的，在各地有很多人在做。”

“这种新型犯罪还有发展升级的势头。”专案组组长、眉山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正祥说，犯罪团伙被打掉时，已经开始瞄上企业税贷，即买下要倒闭的企业，变更法人为企业，再利用增值税缴纳记录等进行贷款，一个企业能贷款300万至500万元，为害更甚。

追赃困难，金融“防风险”多环节需加强

目前，几个团伙的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归案，并移交检察机关，但损失却难以追回。周峰表示，涉案人员有的不是本人持卡，有的通过POS机套现且一机多户，有的通过第三方支付、微信转账，有的在ATM机取现，还有的以购买虚拟货币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境外，追赃十分困难。

四川某银行相关负责人说，去年10月，该行接到500多人此类贷款申请，贷出去1.03亿元。风控发现问题后，紧急冻结了资金，但也只挽回了2000多万元。而这些贷款人的电话很快就换了，催收找不到人。

据了解，在这一案件中，一些吸毒人员

也能轻易拿到贷款。专家表示，犯罪团伙掌握公积金缴存渠道，骗取银行线上贷款，暴露金融“防风险”仍存多种问题。

“针对借贷人员的风险防范提示需细化。”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邱静说，针对缺乏金融常识的高风险人群借贷，应加强借贷时的风险提示，提高其防范意识。贷款转出时，应予以贷款用途、还款义务等提示。

另外，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意识、防护能力还需提高。业界人士表示，当前网络攻击呈现增多趋势，机关事业单位要重视相关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特别要强化信息系统与信息安全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的“三同步”原则，加强网络安全防护。

(据新华网)